

一位摄影家镜头外的人生(中)

◆ 阮义忠

抽屉里的浪花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舍不得丢的杂物,有些经过归档,有些无法分类,就那么一起参杂地搁着,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

我的家乡头城是个东台湾靠海的封闭村子,居民一半务农、一半打渔,连镇上那家历史悠久、破破旧旧的戏院,也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渔渔之家》。这家戏院是无数镇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童年时的梦想窗口。陪祖母在这儿看的一出出歌仔戏,让我对中国历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印象也很难纠正。

电影盛行后,歌仔戏跟着没落,戏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在本土电影方面,大受欢迎的则是模仿美国《劳莱与哈台》的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在交通不便的六〇年代,岛民们透过电影,仿佛也游遍了台湾的名胜古迹。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点点滴滴与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清楚多了。大陆的省份、都市成了台湾的街道名,像陕西路、青岛路、南京路、长安路、西藏路、沈阳路、迪化街、宁波街、哈尔滨街……这样的路名全省可见,提醒百姓“毋忘祖国”。城里、郊外布满“反抗抗俄”、“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等标语,仿佛字写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陆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无论是桥头、巷弄、山顶或海边,不时会出现“此处禁止测量、描绘、摄影、狩猎”等警句,仿佛无处不是禁区。海岸线更是禁区中的禁区,相隔没多远就有海防部队的岗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对岸。在那期间,小小的台湾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隔离岛,直到蒋经国于一九八六年制定解严政策。

还好,有部分海岸线在当时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海水浴场。在这里,浪



■ 戏浪小兄弟,台湾 海岸,1979

花声与人民的欢笑仍能齐鸣。我就是个幸运者,家离海水浴场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尽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去玩水,我们却时常偷偷地到那烫得可以焖蛋的沙滩上打滚,再冲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几个钟头一下就过了。

那时,乡镇村落的电线杆还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树干被削得圆滚滚的,浸过黑黑的柏油后,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两旁。人们在上面张贴宣传传单或寻人启事,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征召船员的广告。

二哥每隔一阵子就会央求父亲让他上船去试试,央求过几年后,终于明白这件事是无望的。后来,我们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当木匠的就是他。当初最想出走的,却认命地成了唯一继承祖业的人。

像那时大多数的人家一样,四叔、五叔都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上班,其中一位还当上课长,算是镇上的小资阶级。在那不经申请就不得聚众的年代,民间的联谊活动都得偷偷举行。四叔、五叔的房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时常被他们用来举行舞会。四叔会吹萨克斯风,他的一些朋友会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弹低音贝斯,一个三五人的小型乐队就这么组成了。

白天严肃木讷的长辈,在晚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活泼、可亲又有趣。保守的父亲却绝不可能如此。这样的印象一直维持到我高中时的某一天,在整理杂物时打开家中一个老橱柜。

那时四叔、五叔已跟我们分家,五婶到小学教书,四婶则是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两家的经济情况都愈来愈好。家人懒得整理他们原来的房间,我便把它打通、改造,变成由我一人独享的空间。四叔留下一个还不错的二声道音响,让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摆设、装置,再把五叔留下的书桌椅摆在恰当的位置,将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放上书架。高中三年,这里既是我的画室,又是我的书房,迷上古典音乐后,还在里面练过几个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间时,我把一个堆满家中杂物的橱柜撬开,发现不少家族的老东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纹路细致的古铜镜、一把日本武士刀、两顶降落伞、一顶日军钢盔,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文杂志、书籍。我揣摩,那面老铜镜可能是祖先从唐山到台湾时所带的传家宝,武士刀、降落伞以及钢盔则说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当日本军夫。

那两顶降落伞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连办完丧事后,写满黑字的白粗布挽联都会被拿来做内衣裤,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问降落伞的来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缝成衣裤,穿出去拉风极了。后来,我才从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轻时因为手艺好,曾被强拉去修补弹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那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国力衰弱,连修补飞机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水

料。武士刀和降落伞,也许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饷。原来,爸爸也是有过去的人啊!

学校里的国语课多半由外省老师担任。他们各有各的腔调,发音也不标准,所以很少学生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师都非常凶,记得小学时,只要是作业没交或是考试不及格,就会被狠狠地处罚。那种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害怕。长大后想起来,对他们倒有几分同情。他们仓促惶恐地来到台湾,一夕之间与亲友、所爱天人永隔,那种痛岂止是锥心!

有些老师相当有学问,或多或少都对我产生过影响。比如说,我的绘画天分最早就是被读初中时的美术老师肯定的。毕业于杭州艺专的他,为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带来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艺术品味。读高一时的导师则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学者,经常讲课讲到兴起,便在黑板上画些甲骨文让我们瞧瞧。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专家把厚实的传统文化,较先进的工业、金融知识勤勤恳恳地传播于台湾小岛。中华文化的种子有幸不受乱世摧残,在海岛的呵护下开花、结果。

在台湾生长的男性必须服兵役,我也于满二十岁那年开始服役三年。由于抽签抽到海军,台湾的各式军舰,除了潜水艇之外,举凡巡洋舰、驱逐舰、运补舰、抢滩小艇,我都上下下不知多少回了。我是通讯士官,必须经常背着沉重的 PR77 无线通话器从大舰跳到小艇,再从小艇跳到滩头。有时还得在风浪大作的海上,从小艇爬绳梯上军舰甲板,随时都有可能被剧烈摇晃的军舰夹死。

属于国民党当局管辖的所有军事岛屿,我全去过。大金门、小金门、大旦、二旦、马祖、北竿、南竿、东莒、西莒,甚至连很少人踏上的乌丘也到过。我们的小艇队在金门驻守过一年。白天,透过望远镜就可清楚看到对岸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虽然身处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却是相连的,拍岸的浪花来自同一片汪洋。

母亲邵华

毛新宇



8.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夫妻俩在这极为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对他们的爱情结晶寄予了无限深情的希望……就这样,外婆带着满腹惆怅,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监狱大门。四下望去,举目无亲,哪里才是安身的家啊?正在她彷徨和惆怅之际,山东省委临时书记吴丽石(化名卢一之)已经在路旁等候着她了。原来,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外婆和刘谦初,吴丽石来山东时,任弼时专门具体布置了营救事宜。

外婆离开了风雪弥漫的济南,一路在王进仁(时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照顾下,顺利到达上海并找到董秋斯,在他们家住下来。董秋斯不但是一位革命者,还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曾翻译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文学名著。他和妻子真不愧是刘谦初的挚友,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像对待亲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外婆的饮食起居。危难之中见真情啊,难怪后来外婆念念不忘这两位救命恩人。

1930年大年初一,张采真闻讯赶来,代表中央慰问外婆,并告诉外婆,中央已经再次指示山东省委全力营救刘谦初和刘小甫。这个消息令外婆稍稍放下心来。3月2日,一个尚在母腹便有了名字的小生命诞生了。这就是我的大姨刘思齐。生下姨妈后,外婆赶忙给丈夫写了报喜信。刘谦初在回信中喜不自禁,一再嘱咐外婆要集中精力管好孩子,把孩子抚育成人,不要为他分心。从此,夫妻俩鸿雁传书,又多了一个关于孩子的话题。

1930年4月初,刚坐满月子的外婆本想请示中央,准备去济南探监,却意外地接到了要她去秘密交通站领受任务的紧急通知。当外婆赶到那里,却发现和她接头的人是在武汉曾有过许多交往、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同乡林育南。这位工人运动领袖告诉外婆,要她立即参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的工作,化名张一萍,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秘书。紧接

着,上级又明确指示让她与“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以假夫妻的名义租住一处,以便于开展工作。又是假扮夫妻,这事怎么总轮到自己头上呢?再说,孩子怎么办?外婆迟疑了片刻,但马上想到党员决不能把个人利益置于组织之上,实在不行那就把孩子送人吧。当外婆回到董秋斯家后,董秋斯夫妇得知了情况,主动承担了喂养思齐的责任,这才解了外婆的燃眉之急。

“苏准会”的任务是围绕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而起草各种法律法令和文件,时间跨度达半年甚至更长,各项工作都必须在极端机密的条件下进行。为此,中央租了一套豪华别墅,装扮成商人和杂役的工作人员住一楼,外婆与林育南住在二楼。白天,她与大家一起研究工作,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整理文件。她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工作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董秋斯家看望思齐。

这时,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军阀战争爆发,敌人后方空虚。根据中央决定,1930年5月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央机关和全国十九个苏区及左翼作家联盟代表等八十余人,共同商讨未来苏区发展的大计。代表们开了四天的会,外婆基本上四天四夜没合眼:所有文件随着随收,有的要立即转移,有的要迅速销毁,有时她一天要换四五套衣裳外出接人送站。会议结束后,她一连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紧接着,她与林育南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整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并日夜向中央苏区等传递着绝密情报。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几个月,蒋介石得知中共“苏准会”在上海召开的情报,大发雷霆,严令限期破案。

令人肝肠寸断的悲剧又一次上演。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因叛徒出卖在上海东方旅馆被捕。2月7日,林育南及左翼作家等二十四人在龙华公园英勇就义。从此,烈士们的碧血和他们的美好愿望,融进了龙华春天那灿若云霞的桃花里。在此前后,外婆又跟着周恩来参与营救被捕的同志,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对刘谦初的营救还没有进展,孩子也顾不上照料,又看着那些亲密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外婆真是心力交瘁,欲哭无泪……

37.竟然是惠子

回到客厅里,袁朴生胸闷得厉害。七尺身躯一时不知如何安放,孤独。无边的洪水般涌来的孤独。迎面的长台上,那把梅樱壶正摆放在正中,用檀木边框的玻璃罩子罩着。那里,原先是一个佛龕的位置。前些日子,来参观梅樱壶的人络绎不绝,古子樱索性把壶摆放在那里,让大家观赏。此刻袁朴生见到壶,心里突然生起一种怪怪的感觉。仿佛那是古子樱的一张得意忘形的脸。袁朴生把玻璃罩移开,拿起壶,依然是古子樱的脸,阴阳脸。当时时怒,转而又笑得慈祥,忽又歹毒,继而奸猾。一个长者的声音在耳边嗡嗡地响,好像是陶半坡老人在仰天长啸:梅与樱,本非同根,何融一树?

顿悟。从天而降。伴随着深深的屈辱。他猛地挥起胳膊,那壶“啪”的一声,在地上摔了一个大响炮。壶的碎片飞溅到他的下巴上。像是被刀片划了一下。暗红的血顺着他的脖子,像一条毛虫一样往下蠕动。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个颤颤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袁桑,你没事吧?美智子!他脱口道。转过身一看,啊,竟然是惠子!为什么不是美智子呢?如果这个时候她突然出现,他心里还能好受一些。惠子……你不是跟着衫门昂立他们去参加游行集会了吗?我,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路,放心不下你,就回来了。哦,那又何必!袁朴生冷冷地说。

惠子突然叫起来,袁桑,你流血了!惠子走到他跟前,掏出一条白色的手帕,按住了他的下巴。他急忙闪开,冷淡地说,不要碰我!惠子怔住了。她脸色苍白地看着他。手上的帕子已经沾满了血。别忘了我是清国人,现在清国战败了。你们在欢呼胜利。你走吧,不要和我挨得太近,免得让你的家人看到了,说不清楚。不是的,不是的。惠子摇着头说,在惠子眼里,袁桑就是一个有教养的好男人。别的,都跟我没有关系。虽然,袁桑不是惠子的,但惠子心里,只崇拜袁桑这样的男人。至于衫门昂立,只是哥哥送给惠子的一件拙劣的礼品,况且,他已经报名参加海军,我们之间也该结束了。

袁朴生怔怔地听着,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惠子知道的,其实袁桑心里是喜欢美智子的。惠子看了他一眼,缓缓地说道,哥哥一心想着袁桑能做出一件可以称为国宝级的东西。为了讨得袁桑的欢心,他原先想把惠子送给你,可是后来,他发现你有点喜欢美智子,就让她来接近你。袁朴生的脸突然火辣辣的。

哥哥是个有抱负的人。为了实现他的抱负,他可以不顾一切。他和美智子的感情并不好。哥哥常年在外,而美智子在外面,也是有情人的。他俩之间谁对谁错,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哥哥答应她,只要把袁桑拿下,他可以给她自由。而袁桑最终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和美智子并没有发生什么。这一点哥哥暗地里很佩服。可是,因为你辜负了美智子,她要获得自由恐怕没有希望了。原来如此!

袁朴生背心里起了一层冷汗。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来路和出处的,那么小野次郎是因为什么原因来跟我学艺的呢?袁朴生问。

哦,早先哥哥曾经跟小野的姐姐相好过,那个女人还为哥哥堕过胎,那时还没有美智子呢。我想,这是哥哥还给小野姐姐的一个人情吧。

东洋赤佬!袁朴生用家乡话骂了一句。惠子显然没有听懂他说的什么意思。突然她看到了地上的碎片。怔了一会儿,蹲下身子,低声说,惠子知道的,袁桑终究会把它打碎。惠子把沾了血的帕子摊在地上,把散落的碎片一点一点捡起来。幽幽地说,日本胜利了,可是,哥哥失败了。

我很抱歉,惠子。袁朴生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来。袁桑,是我们很抱歉,让你受惊了。惠子的眼睛里闪烁着薄薄的泪光。她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柔美起来。袁朴生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憎恶这个日本女人。是的,她有什么错?她一直默默地喜欢你,不管他接受与否。而美智子,说到底底是无辜的啊。对于她们,他觉得自已心里是有亏欠的。

惠子抬起头来看他的时候,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惠子眼睛里那种柔和的光亮穿透了他的心。惠子!他沉吟道。袁桑,待会儿他们回来,我就说梅樱壶须是我不小心打碎的,跟你没有一点关系,答应我,拜托了!

国壶

徐风

